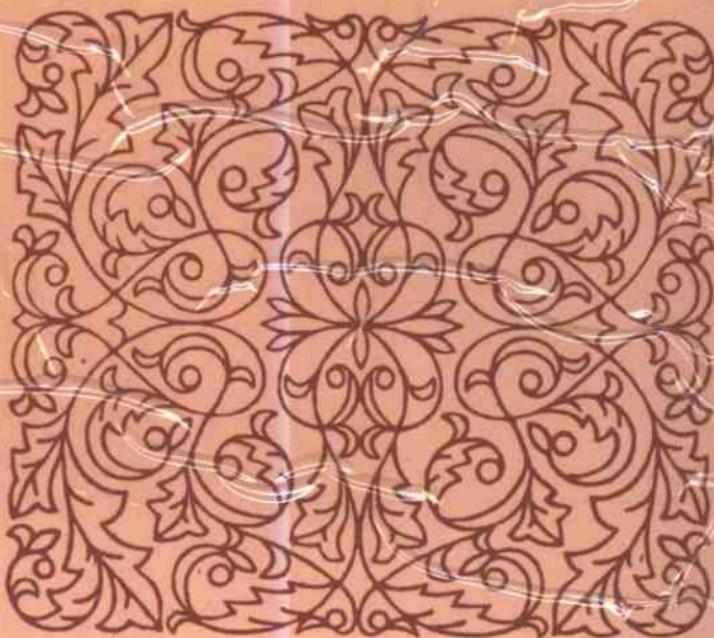


民國叢書

第五編

• 48 •



民國叢書

第五編

· 48 ·

文學類

上古秦漢文學史
漢魏六朝文學
中古文學史
唐代文學史
五代文學

柳存仁著
陳鐘凡著
劉師培著
陳子展著
楊蔭深著

上海書店

中華民國十二年九月再版

每本定價大洋四角

編輯者 劉 師 培

版 權

發行者 國立北京大學出版部

所 有

印刷者 國立北京大學出版部

本書據商務印書館1948年版影印

呂序

『絲不如竹，竹不如肉，何也？曰：爲其漸近自然。』天下惟自然最美，人工修飾之物，總不如自然的有天趣，所以文章要貴天籟。但是自然之美，發達到一定程度時，加以人工修飾，又是勢所必至的。這個，正代表着自上古至兩漢文學發展的趨勢。

最古的文字，我們現在已經看不見了。或者亦可以說現在還沒有發見。我們所看得見的最古的文字，大約可分爲三類：一種是金石刻文，和尚書中真正出於古書的一部分，這是散文。一種如老子之類，這是口訣。一種如詩經中較古的一部分，（詩歌的初起，其美是只有其音節的，辭句並無甚意味。而且往往三重四複，並沒有說出什麼話來，如詩經中之芣苢即是。）這是詩歌。都是很質樸的。散文要到戰國策，歌訣之類要到易文言，韵文之類要到楚辭，才算較爲發達。（此以大體言，詩經中較後起的一部分，自亦包括在內。大抵詩經中，風是較元始的，雅頌是較後起的。）這都是春秋戰國時代的事。秦漢之世，還是循着這個趨勢前進。散文如賈、董、司馬氏等，固然是意無不盡。詩歌出於較通文墨的人的，則由四言發展爲五言；其存於農夫野老婦人孺子之口的，則爲漢武帝時所采的趙、代、秦、楚之謡，後人以其機關之名稱之，謂之樂府。

這時候的文章，完全是出於自然的，出口成章，並不加以修飾。然而經過一個時代，人工

的修飾，就要隨之而起了。這一個運動，使文字的數目，大大增加。又把一部分古語，代替了當時的言語，使言文漸漸分離。這一個運動，把文字的內容擴大了，却使其趣味減少。

秦漢時代的字書，我們所知道的，有李斯所作的倉頡篇，趙高所作的爰歷篇，胡毋敬所作的博學篇，合計三千三百字。（其中本有複字，後已被揚雄換去。）揚雄所作的訓纂篇，二千四十字。班固所作的十三章，七百三十二字。合計六千七十二字；現存的說文解字，則其部數為九千三百十三，可見字數的逐漸增加。這種增加的字，果何從而來呢？我們試看東漢、魏、晉時崇尚古文學的人，每每訾議人家不識古字，如尚書爲孔安國傳序說：「科斗書廢已久，時人無能知者。」這固然是野言，然其說亦必有所本。篆隸之異，只是筆畫形狀，識隸書的人，斷無不識篆書之理。然則所謂時人不識古文者，與其說是字體的改變，還不如說有許多廢而不常用之字，又給好古的人去搬出來了。漢書藝文志說：「元始中，徵天下通小學者以百數，各令記字於庭中，揚雄取其有用者以作訓纂篇，而揚雄傳說：劉棻嘗從華學作奇字，所謂有用，就是日常使用的，所謂奇字，就是不甚行用的，如現今所謂業經死去的文字了。這許多字，給做文章喜歡博洽和生僻的人，又通統搬了出來。然而還不止此。三國吳志處翻唐注會稽典錄說：孫亮時，有山陰朱育，少好奇字。凡所特達，依體象類，造作異字一千名以上。可見當時好奇字的人，還有自造新字的。（當時好辭賦者，多稱其能多識鳥獸草木之名，此等名詞中，必多新造之字。）把已廢不用的古字，通通搬了出來，再加以自己之所造作，其所做的文章中，人

家不認得的字，自然多了。我們現在讀漢賦，生僻的字極多，就是爲此。這種趨勢，在做文章的人，除使人震驚其博洽，及感覺一種生僻之趣外，並無別種意味。

還有一種，便是所謂爾雅運動。雅與夏卽係一字。大概古代音讀之殊，以楚夏爲兩大宗，亦即如今南北方言之異。因文明程度的高低，在古代的趨勢上，早就以夏言爲正。所以論語上說：「子所雅言，詩、書、執禮，一而孟子譏許行爲『南蠻陋舌之人』。」然而到漢代，所謂爾雅者，已非復近於夏言之謂，而爲合於古語之意。公孫弘請置博士弟子說：「詔書律令下者，明天人之際，通古今之義，文章爾雅，訓辭深厚，恩施甚美，小吏漢陽，不能究宣，無以明布諭下。」史記樂書說：「今上卽位，作十九章，通一經之士，不能獨知其辭，皆集會五經家相與共誦講習之，乃能通知其意，多爾雅之文。」〔漢書王莽傳〕莽頃符命四上，篇於天下，「其文爾雅依託，皆爲作說。」這所謂爾雅，明明都是近古之義。雅字何緣有古字之義呢？顏師古說：「爾雅，近正也。」蓋初以雅言爲正，而雅字遂引伸而有正字之義，其後改以古語爲正，爾雅之義，就從近正變爲近古了。在此趨勢之下，修辭造句，都可以古爲準，不顧其與口語合否，不但不以之自慊，而且還以之自矜，而言文遂漸漸分離。

言文的分離，和作文好用冷僻之字，不過使人見了覺得有一種新奇之感。順此趨勢，遂有造句亦務求其特別的。譬如揚雄諫止哀帝拒絕烏珠留單于來朝，書說：「往時嘗居大宛之城，距烏桓之壘，探姑繕之壁，籍蕩阻之場，艾朝鮮之旗，拔兩越之旗，近不過旬月之役，遠不離二

時之勞，固已犁其庭，掃其閭，郡縣而置之，雲徹席卷，後無餘菑。唯北狄爲不然，真中國之堅敵也。三垂比之縣矣，前世重之茲甚，未易可輕也。此中居城，踏壘，探壁，藉場，艾旃，拔旗，句句變換，以及犁庭，掃閭，雲徹，席卷等，都是有意選用的新奇可喜，富於刺激性的字眼，而句調亦極整飭，這都是有意爲之的。這種文字，在當時大約惟懂得小學，而又擅長辭賦的人，乃能爲之，『達而已矣』的文學家，都不能爲。我們讀此等文字，亦未嘗不激賞其組織的精能，極人工修飾之美，然而比諸衝口而出，純任自然的文字，總還覺得其天趣的不如。文章最精微之處，在於聲調。聲調之美，無過於太史公，這大約是講舊文學的人，十之八九，可以承認的。太史公的文章，聲調之美，原因何在呢？我敢說全在其基於口語。我們讀古書，覺得在先秦時代，句子的冗長，無過於墨子，在兩漢時代，則無過於史記。（足與史記並稱的，其實不少。如王充論衡，其辭句亦甚冗蔓。）墨子書句子的所以冗長，即因其上說下教，只求人之易解，而不求其美麗之故。史記句子之冗長，是人人所知，其實已經鈔寫的人刪節過了。真正史記的原文，比現在我們所看見的還要冗長一些，試看史通點睛所引可知。史公文字句子的冗長，無疑的，乃由其按照當時的口語寫出。此等文字，在言文業經分離，行文力求簡潔之世，文學家怕多數覺得其該刪改的，不過拘於尊古的習慣，少有人敢繼劉知幾之後而言點煩罷了。然而文章筆調最美的，却亦出於史記之中。試看太史公自序：『遷生龍門，耕牧河山之陽。年十歲則誦古文。二十而南遊江、淮，上會稽，探禹穴，窺九疑，浮於沅、湘，

北涉汝、泗，講業齊魯之都，觀孔子之遺風，鄉射鄒嶧，尾困鄆、薛、彭城，過梁、楚以歸。於是遷仕爲郎中，奉使西征巴、蜀以南，南略印、笮、昆明，還報命。是歲，天子始建漢家之封，而太史公留滯周南，不得與從事，故發憤，且卒，而子遷適使反，見父於河、洛之間。據問題於弗論，而這許多句子之中，除『年十歲則誦古文』，『於是遷仕爲郎中』，『是歲天子始建漢家之封』，『故發憤且卒』數語而外，無一句不有地名。使有意於做文章之人爲之，其聲調豈復可誦？即使勉強做到可誦，亦至多不至於棘口，要求誦之而覺其和諧宛轉，必不能了。而太史公却能之。此豈其別有繆巧，不過卽本於當時的口語罷了。無論那一種語言，都有其自然的聲調，自然的聲調，無不和諧宛轉，曲盡其妙，爲學做文章的人窮老盡氣所不能至，此卽所謂天籟，此卽所謂自然，爲人工修飾所萬不能及。現在守舊的人，極力反對語體文字，而不知其所認爲最美，奉爲典型，終身學之而不能至的，正卽若干年前的語體文字；而現在的語體文字，過若干年後，其中精美的，亦必爲後人所欣賞，一如吾儕今日之於先秦兩漢之書，（但鄙倍者除去。此則古文中亦有鄙倍者，不獨白話也。）雖事非吾儕所能見，而理却可以預決的了。

然當時的人，讀了此等文字，不過如我們今日之視語體文字，或者淺近文言，並不覺其如何美妙，而其所視爲美妙的，倒是加以人工修飾，使之與自然相遠的。於是用字務求新奇，造

句務求齊整，逐漸形成漢、魏時代的駢文了。駢文初興之時，去口語尚不甚遠，未至完全不適於用。到後來愈離愈遠，不但不適實用，而且其所謂美者，亦實在覺得索然了。於是又有所謂划除浮靡的運動，而韓退之遂被稱爲文起八代之衰。上古時代，文學漸次萌芽，到東周西漢之上而達於極盛。其時人工修飾之弊漸興，亦即自然之文體漸壞。至文體之壞達於極點，而文學變遷，實具有佛法上成、住、壞、空四種相，而先秦兩漢的文學史，該括著其中的前三種。

此時期的文學史，是非在文學上有相當修養的人不能做的。不憚舊文學不好，不憚新文學又不好。而且講到此時的文學，非略通古書義例不可，這又是不能不憚得考據的。要這三方面兼擅之才，却真不易得了。而這一部書就是其書。內容讀後自然見得，無煩我的徵引了。

三十年一月五日於孤島，武進呂思勉。

本書據作家苦屋1944年版影印

目 錄

一	說到唐代文學	一——六
二	初唐詩人	七——二十五
三	盛唐詩人	二六——六〇
四	中唐詩人	六一——八五
五	晚唐詩人	八六——一〇〇
六	古文運動	一〇一——一四
七	唐人小說	一二五——一三三
八	晚唐五代詞人	一二四——一五八

一 說到唐代文學

說到唐代文學，我以為劉昫「舊唐書、文苑傳」，宋祁「新唐書、文藝傳」都紀載得很好，可是他們論文的宗旨却有不同。劉昫生在五代古文中絕的時代，偏重駢文；宋祁生在北宋古文復興的時代，偏重古文。劉昫最贊美初唐之文，說是「文皇帝解戎衣而開學校，飾貞帛而禮儒生。門羅吐鳳之才，人擅振蛇之價，靡不發言爲論，下筆成文，足以緯俗經邦，豈止雕章縟句。韻諧金奏，詞炳丹青。故貞觀之風，同乎三代。高宗、天后尤重詳延。天子賦橫汾之詩，臣下繼柏梁之奏，巍巍濟濟，輝耀古今。」宋祁則最贊美中唐之文，說是「大歷貞元間，英才輩出，燭燭庭庭，炳冰鑿涯。於是韓愈倡之，柳宗元、李翱、皇甫湜等和之，排逐百家，法度森嚴，

，抵鑠晉魏，上軋漢周，唐之文完然爲一王法；此其極也。」劉鈞於唐詩特提王維、杜甫；宋祁於唐詩別特提杜甫、李白、元稹、白居易、劉禹錫。而以侍從酬奉之作推許李蟠、宋之間、沈佺期、王維；譎怪之作推許李賀、杜牧、李商隱。如上所說，可見劉鈞宋祁論文，宗旨不同，他們眼中的唐代文學也頗異樣了。假使我們論唐代文學要分初盛中晚四明的話，那末宋祁最推崇中唐之文，而不提及晚唐，於初唐之文沿襲南朝頗有微詞，於盛唐之燕許大手筆始稍爲推許。他說：「唐有天下三百年，文章無廬三變。高祖太宗，大難始夷，沿江左餘風，繙句繪章，樸合低卑，故王楊爲之伯。玄宗好經誥，羣臣稍厭雕豫，索理致，崇雅黜浮，氣益雄渾，則燕許擅其宗。是時唐興已百年，諸儒爭自名家。」下文他就說到韓柳了。他於中唐韓柳一派的古文說是「播磨道真，涵冰聖涯，」推崇已極，所以他就不得不以中唐爲唐代文學最盛的時期，他不論及晚唐之文也是當然的了。

就文學本身的發展進程而說，李唐一代是文學史上最好分期的一個時代。在這

以前，八代文學以古體詩和駢文爲盛；在這以後，就以近體詩和古文爲盛了。近體詩講求聲律，雖說因受佛典文學轉讀譯讀的響影而起於齊梁之際，實則到唐代而近體詩的規律才算確立。加以唐代音樂因融合胡樂俗曲的結果而新聲轉盛，自然於當時入樂的詩歌有些影響。唐詩聲韻之美，和後來詩人對於唐音的贊歎，不是沒有來由的。

再就文學產生的歷史影響和社會背景說，在八代中間經過五胡亂華，南北朝對立。所謂胡虜，都是西北或靠近東北的遊牧部族，漸漸成爲中華民族的新分子，他們的民族性伉爽直率，慷慨悲歌，自然有一部分融化到中華民族的裏頭。直到隋唐統一，經過幾百年，中華民族同化諸部族的艱鉅工作才算告一段落。唐文學以固有的溫柔敦厚的底子加上許多外來的慷慨悲歌的成分，通過南朝的鉛華靡曼參以北朝的伉爽直率，因民族性格的融合與文化風格的融合，不知不覺中就產生出一種異彩來了。我們還應該知道：唐代自李淵起兵，化家爲國，承南北朝喪亂之後，隋煬帝

荒淫之餘，削平了割據的羣雄，造成了統一的專制的一個大帝國，人民也就樂得休養生息，安於一種小康的狀態。直觀盛世，至於對米三錢（「魏徵傳」）。直到玄宗，百年之間，難聞見水旱蝗螟等災荒，一經販給，便又相安無事。而且玄宗開元年，累歲豐稔，京都米斛十錢，青州米斛五錢，（「本紀」）真算是所謂太平盛世了。這時候在民間以有了剩餘經濟之故，自然可以產生多且有文學教養的知識份子。在政府方面，貴族官僚只知道歌舞太牛，鋪張盛世，怎樣的誇耀功德，煊示權威。文學恰好給他們利用作爲這種工具。所以當時詩歌的大部份不是奉和應制，就是樂府歌辭，揄揚或娛樂聖主賢臣以及諸王公主之作。如從四傑沈宋以至蘇張的才子筆，就大半是訛詭頹死的文章。只因當時正需要這種文學，不然，便得不到國家的豢養，也就不能見重於社會了。「舊唐書·張說傳」裏說：「當承平歲久，志在粉飾盛時。中書舍人徐摩自負文學，常以集賢院學士多非其人，所司供餚太厚，嘗謂朝列曰：此羞於國家何益。如此虛費，將建議罷之。張說曰：自古帝王功成則有夸縱

之失，或與池臺，或玩聲色。今聖上崇儒重道，親自講論，刊正圖書，詳延學者。今麗正書院，天子禮樂之司，永代規模不易之道也。所費者細，所益者大，徐子之言何其隘哉。玄宗知之，由是薄鹽。」其實，玄宗這種粉飾盛時的政策，還是承襲了祖先的傳統。因為從太宗高宗歷武后中宗睿宗各朝，莫不提倡文學，重用文人，先後設置了文學館弘文館崇文館修文館等清要機關，招攬一班文人學士，又常常舉行君臣詠賦，吟詠倡和的宴會。還定下了天下英雄入彀中的考試制度，兼用詩賦取士，開了文人獲得利祿的一條捷徑。同時文化的各方面如宗教（三大教並行不悖之外，他如回教景教祆教摩尼教等也先後傳入中國）藝術（如建築雕刻音樂繪畫書法之類）等都很自由的得到相當的發展，也足以豐富文學的內容，提高文學的水準。至於唐代武功之盛尤為秦漢以來所未有，所以高祖說：「胡越一家，自古未之有也。」太宗紀功詩說：「聖朝黜白王，除凶報千吉。」當時皇帝是諸邦君長共載的天可汗。是中國民族力最強盛的時代，四夷歸附、中外交通，彼此文化也得到了交